17

十九世紀的廣東鼠疫：本土的還是外來的？

曹樹基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

西元1894年廣州與香港的鼠疫大流行，是鼠疫流行史一個標誌性的事件。關於此次疫情的源起，從伍連德至班凱樂(Carol Benedict)，主流的觀點一直認爲鼠疫菌來自雲南，是從雲南赴北海的清軍攜來。廣東的鼠疫學家雖然持反對的意見，但他們只限於邏輯的爭辯，而無切實的證據推翻成說。本文通過對於史料的認眞辨析，又通過新史料的發掘，證明所謂廣東鼠疫傳自雲南之說的不成立。十九世紀廣東的鼠疫菌，實際來自屬於廣東省所轄之雷州半島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南方內地鼠疫的傳播，主要是通過村莊至村莊的模式，跨區域的陸地商業貿易，無助於疫情的長距離傳播。

一、前言

19世紀末葉發生的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香港是其擴散的中心。香港的疫情來自廣州，廣州的疫情來自北海。今天屬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管轄的北海市，在1952年以前，連帶其所屬之廉州府境各縣，一直屬於廣東省轄。因此，鼠疫疫情從北海傳入廣州，仍屬於疫情在省內的傳播。然而，北海是一個貿易港口城市，本身並不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北海的疫情一定是外來的。長期以來，研究者大都認爲北海的疫情來自雲南。這樣一來，1860年代雲南的鼠疫大流行，遂成爲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之嚆矢。

細檢文獻，筆者發現北海鼠疫源自雲南一說，並無堅強的資料證據。即使是

推理，也多有破綻。本文的問題是，如果北海鼠疫並非源自雲南，那麼，究竟何處爲北海疫情之源，即究竟何處爲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之源？

二、北海疫情與雲南的關係

1860年代的北海，是中國鼠疫流行史上一個繞不過去的重要城市。伍連德對於北海鼠疫相關資料的整理用力最深，茲轉述如下[1]：

> 首先述及北海之鼠疫者，似為英國海軍醫官林志氏(A. R. Lynch)，其1879年之報告，見於羅德各立夫氏(Netten Radcliff)所著之東方鼠疫進行錄中(1880年)附有一圖8-1，示此病由北海入雲南之途徑。北海海關醫官羅利氏(J. H. Lowry)于1882年曾作一確定之紀錄，謂：「余於此處所見之流行，似與從前者不同，十五年前始行發現，其後則隔期一發。」

英國海軍醫官林志氏弄反了疫情傳播的方向，在此暫不討論。羅利氏明確將北海鼠疫流行的時間上溯至1867年。這一觀點遂成定論。伍連德繼續說：

> 1867年，似為鼠疫初起期，據保勒氏(Dyer Bail)之意見，謂自該病以後，此病每年發見，但不劇烈耳。
>
> 1871-1877年，每年春季，此病發見，香港海關副稅務司喀克氏(T. E. Cocker)于1871年，曾見一劇烈爆發，染病死者非僅鼠類，且有豬牛等(辛博森氏)，其後最劇烈之爆發，似見於1877年。

鼠疫散在發生與爆發，交錯進行。在北海，每隔數年即有一次大流行。這符合鼠疫流行的規律。

1 伍連德等，1937，頁13-15。

> 1882年，羅利氏又見一劇烈爆發。據海關十周年報告，該病首先發見於欽州(在西方60英里)，次見於廉州(距北海12英里)，最末乃見於北海。起於三月末，逐漸減輕，至六月杪始息，于廉州則至8月。羅利氏推測北海之死亡數，在兩萬五千居民中，約有四五千人之譜。該次大流行之時期，及其前期，均有戲疫發見。發見該病之屋內，均有鼠逃出穴外，死於地上。羅利氏曾剖驗多頭，發見器官充血，亦有肝臟腫大等變化，但用顯微鏡檢驗，並無具體發見。

在1894年之前，科學界尚不知鼠疫乃由鼠疫桿菌所引起。羅利氏顯然不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微生物學家，否則，發現鼠疫桿菌的殊榮，就可能歸功於他。儘管如此，羅利氏已經發現病鼠之器官充血和肝臟腫大等病理特症。這是腺鼠疫的典型臨床特徵。

伍連德也討論北海疫情的由來問題。他引羅利氏的話說：「該處與雲南之通商，固始於1870年之前，但以輸入貨物而論，不似有傳帶該病之可能。」接著，伍連德又引辛博森的觀點，再加討論：

> 辛博森氏謂雲南至北海之路，遠且難行，二地距離約三千里，分四十八站。雲南輸出之產物，以鉛及鴉片為大宗，輸入者則為棉織品，故渠以為此病並非藉商務途徑而傳佈，其理由為「當1866年鼠疫流行於雲南府之際，該府適有戰爭，居民死者十分之一。由雲南歸回之軍隊，有去北海者，翌歲該處遂發生此病」。

伍連德否認了雲南至北海之間由商路傳播鼠疫的可能性，遂推測疫情傳自從雲南調入的軍隊。從商業上說，鉛或銅以及鴉片的貿易，包裝的材料簡單，體積小，馬馱騾運，疫鼠何以藏身？紅河或西江上游，河流淺，險灘多，水流急，大船無法航行，貨船小且底窄，疫鼠何以藏身？沒有疫鼠同行，即使有被疫蚤叮咬的挑夫或船工，三四日內，疫發人亡，傳染源難以爲繼。很難想像有這樣一種可能，即一群挑夫或船工，玩一種類似死亡接力的遊戲，並在此過程中將疫情從雲南昆明或蒙自等地攜至北海。從軍隊方面論，在長達三千里的長途跋涉中，清軍怎樣

能夠接力式地將鼠疫菌攜至北海，而不見於清軍將鼠疫菌攜至其他地方？廣東的鼠疫專家早就認爲：「即使這個士兵是一個潛伏期的鼠疫患者，在一個多月的行程中(每日按70-80里行程計算，3,000里路需要一個多月時間)，恐怕早于死於途中，而又如何能把鼠疫傳入北海，待至翌年才發生流行呢？除非是大批軍隊把糧草直接運輸到北海，或許有這種可能性，然而事實上並無這樣的記載。因此我們認爲由士兵從雲南把鼠疫傳入北海的可能性很值得懷疑。」[2]

光緒《續修昆明縣志》卷7〈五行志〉載同治二年(1863年)昆明縣「大疫」，四年「仍疫」，以後頻年皆疫。據1950年代的調查，這些疫情皆爲鼠疫。如果沒有戰爭，昆明疫情大規模且迅速的向外傳播，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沒有戰爭做騷動，清代中期雲南鼠疫從西部傳入中部，就花費了幾十年時間[3]。

清咸豐六年(1856)，雲南的回、漢兩族爲爭奪銀礦發生衝突，地方官吏暗中挑撥，護漢殺回，終使矛盾激化，迫使各地回民紛紛揭竿。杜文秀領導的滇西回民軍隊勢力最大，他們占領大理、麗江一帶。同治五年(1866)、六年(1867)，原駐於雲南的大批清軍被調往相鄰之貴州，鎮壓貴州苗民起義。乘雲南清軍外調之機，同治六年七月，杜文秀率所部十萬大軍，兵分四路東征昆明，連破楚雄、武定、尋甸等30餘州縣，直抵昆明城下，從北、西、南三面對昆明城形成包圍之勢。1867年春天，北海的鼠疫即已發生。由此看來，1867年北海鼠疫自雲南傳入，與戰爭無關。另外，清軍調往貴州並與貴州苗民展開戰爭之時，未見貴州有任何疫情發生。北海疫情從何而來？

儘管伍連德從專業的角度否定了雲南鼠疫借助商業包裝和運輸傳入北海的可能性，但班凱樂(Carol Benedict)在她的著作中還是對這一假說提出了許多證明。她認爲，1729年，政府修築了由雲南呈貢至廣西田陽的道路，於是，從昆明至南寧之間的路程，縮短了一半。西江也就成爲雲南至廣西、廣東的主要通道。到19世紀中期，雲南鴉片已經被廣泛地運輸到廣西和廣東。

在1840年代，百色—南寧的西江航路是廣州—雲南的基本航路。到1850和1860年代，地方匪幫、秘密社會和起義者的活動中斷了這一航路，廣東商人更多

2 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1988，頁1480。

3 李玉尚、曹樹基，2001，頁19-32。

地是通過廣東西海岸和南寧抵達西江(右江)，或通過海防到達紅河，或從廣東西部出發，沿中越邊境之東京灣，從陸路抵達雲南。19世紀後半葉的北海，主要是作爲雲南—嶺南的鴉片貿易的一個中心點存在的，即北海是鴉片貿易中的海運、河運和陸運的交匯點。

班凱樂認爲，有證據表明，就是在廣西的太平天國及三合會及雲南的杜文秀起義時，鴉片的國內貿易仍然是相當繁榮的。混亂甚至導致了雲南—嶺南之間鴉片貿易的擴大，這是因爲清政府權威的崩潰，使得這種不正當的藥材貿易變得不受約束了。關於這一點，當時在雲南及緬甸活動的西方人有詳細的觀察。從雲南的蒙自和昆明到達北海的道路上，充斥著鴉片、匪幫和政府的軍隊。這一切，爲雲南—嶺南間的鼠疫流行創造了條件[4]。

然而，這一系列看似完整的長距離商路假說並不能回答筆者疑問，以鴉片的簡單包裝，以及內河小船狹窄的空間，怎麼可能保存鼠疫菌長時期內的存活。在世界鼠疫流行史上，鼠疫疫情的長距離傳播，往往與海船運輸有關。海船的空間巨大，結構複雜，有許多地方可供疫鼠藏匿。海船裝載物質的數量多，船員人數也多，鼠群大，鼠口多，鼠間鼠疫的流行，使得海船上的動物疫情可以長時期的維持，進而影響人類。陸地的旅行，尤其是在西南或華南山區的旅行，由於缺乏維持動物間鼠疫流行的必要條件，鼠疫疫情的長距離傳播是很難想像的。

三、廣西疫情：鼠疫與霍亂

廣西早期的鼠疫資料來自龍州。在上引同一文獻中，伍連德搜集的相關資料如下：

> 賓倫氏(Thoulon, 1899年)又稱於1891年，該處及龍州有一較輕之流行。
>
> 地內氏(Sharp Deane, 1890年)謂龍州曾於1890年3月時被襲，並謂該病「發源于雲南，經百色城及廣西南寧與太平之都境而至龍州」。

4 Carol Benedict, 1996, pp. 49-64.

> 羅氏(Bruce Low，1900年)述及1889年龍州之爆發，並謂一年後該病發見於北海及廣州間沿岸之烏涌……。
>
> 西門氏於1893年與1894年時，復于龍州發見鼠疫，渠信此病由雲南傳入廉城之兵營，復由該處傳至龍州。首先染患者為兵士，于1894年，業已停止十年之久，鼠疫乃又爆發于北海及其附近之地，時期在四月至六月之間，為害甚鉅。

上引資料中的第三條頗令人驚奇，西門氏相信龍州的鼠疫是從雲南傳入廉州府的兵營，再傳入龍州的。龍州、廉州相距遙遠，疫情傳播不知如何發生？另外，仔細比對《中國鼠疫流行史》有關龍州疫情之論述，除了一條外，全部引自以上三條。唯一的例外是這樣寫的：「據法國傳教士稱，廣西鼠疫始于龍州(1866)。」[5]雖然言之鑿鑿，但資料來源不明。

在廣西，可靠的鼠疫疫情資料始於1867年，光緒二十五年(1899)《上林縣志》卷1〈天文〉有以下記載：

> 同治四年乙丑，夏，時疫流行。六月旱，穀貴。五年丙寅，春夏穀貴，死者無算，下鄉鄉一帶尤甚。六年丁卯，鼠瘟死，民患瘡，其瘡隱在皮裡，或長或短，且能移動，患重者多昏憒，治之不得其法，恒不救。自此至十三年，其患始息。

同治六年(1867)上林縣的疫情是腺鼠疫，不容懷疑。同治四年(1865)的時疫到底是什麼呢，值得追究。在與上林相鄰的隆山縣，民國《隆山縣志》這樣說：「同治四年，霍亂流行，患者手足抽搐，人死甚眾。」[6]比照觀之，同年上林縣的「時疫」應爲霍亂。民國《隆山縣志》接著論述光緒二十二年的鼠疫，稱「其初耗鼠先斃，既而人生患瘋，瘋發無定處，且能移走，患者身肚熱，十無一愈」。

5 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1988，頁1683。
6 民國《隆山縣志》第八編《大事記·災異》。

腺鼠疫的症狀辨別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說，在1860年代中期的廣西西江流域，霍亂與鼠疫幾乎是同時發生的。

民國二年(1913)《隆安縣志》卷4〈前事考〉稱「同治三年疫」。班凱樂將此疫當作鼠疫[7]。1951年隆山縣與那馬縣合併爲馬山縣，而隆安與馬山毗接。因此，從上引隆山縣的資料看，與其說此疫是鼠疫，還不如說是霍亂更有可能。

班凱樂所引民國三年的《武鳴縣志》稱同治四年「疫盛行」，暗指此疫可能爲鼠疫。然而，同一記載中還有其他疫情：咸豐四年(1855)「瘟疫盛行」，道光三十年(1850)「秋，東路大疫，死者無算」[8]。可見同治四年武緣縣的疫情由來已久。在光緒《武緣縣圖經》中，在道光三十年之前，還有道光三年和同治七年的疫情。咸豐四年和同治四年的疫情不見記載[9]。根據隆山縣的疫情進行推測，是疫也可能是霍亂而不是鼠疫。

班凱樂將同治四年遷江縣疫情也當作鼠疫。原文的記載是這樣的：「五六七月，瘟行大行。」[10]依同樣的理由，是疫仍爲霍亂。不僅如此，遷江縣的霍亂由來已久。同一資料記載，道光二十四年(1844)，「瘟疫大行」。道光三十年(1850)、咸豐五年(1855)和咸豐十一年(1861)均「瘟疫大作」。自1817年傳入中國後，霍亂即開始了在各地的流行。只不過，由於1867年上林縣鼠疫疫情的爆發，使得後來者不明就裡，錯將霍亂當成了鼠疫。班凱樂對上述各縣資料沒有進行完整的分析，僅摘取了某個時段，且先入爲主地將「疫」或「大疫」理解爲鼠疫，由此而鑄成大錯。

19世紀中葉廣西西江流域多種疫情的爆發，可以看作地方社會動亂的結果，民眾的反叛與政府的鎮壓，導致當地疾病的大規模流行。

以疫情爆發最早的遷江縣爲例，上引同一文獻證明，道光二十四年以後的每一次疫情的爆發，都與戰爭導致的動亂有關。如道光二十九年桂平大潢江山豬箭帶領的「賊」共4,000人進入遷江縣境，接著就有了道光三十年的「瘟疫大作」。這一年以後，來自貴縣、賓州等地的「賊」常常入境，燒殺搶奪，人數通

7 Carol Benedict, 1996, pp. 60-64.
8 民國《武鳴縣志》卷10〈前事考·附災祥〉。
9 光緒《武緣縣圖經》卷7〈叙略上·前事中〉。
10 光緒《遷江縣志》卷4〈紀事·祥異〉。

常多達數千人。咸豐四年，三月進入的「賊」有數百人，自來賓縣來；四月，來自賓州的「賊」有三四千人，攻入了縣城；五月，縣境內土匪二千餘人；六月貴縣的「賊」首劉八帶眾三千餘人進入；十月，來賓「賊」率二三千人來援；臘月來賓「賊」千餘人擄掠城廂西鄉。甚至有名叫韋扶過的叛民，自立爲皇帝，咸豐五年春爲知縣率團練剿殺。接著就是咸豐五年的「瘟疫大作」。這年的疫情發生在春天之後，可能爲夏天，與霍亂流行的季節一致。咸豐九年十一月，石達開部約十餘萬人抵遷江，「連營數十里」，戰爭的規模擴大。這一情況維持到咸豐十年，石達開部來來往往，人數少輒數萬，多輒十餘萬。十一年夏天，「瘟疫大作」。在遷江，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與「賊」、「匪」及從廣東遊入的「髮逆」作戰的，主要都是地方團練。而這些「賊」、「匪」或「髮逆」主要是從遷江縣的東部遷入的，與雲南幾乎無關。事實上，遷江縣距離雲南，沿西江航道上溯，約有400公里之遙。如此遙遠的距離，疫情的傳播是不可想像的。

由於所閱《上林縣志》無相關篇目，該縣具體的社會變動無從得知。不過，從其他地方志所揭示的情況看，上林縣也與遷江一樣，有著相似的社會背景。在上林縣西部的百色廳，洪秀全金田起事之後，「左右兩江賊多蠢動」。整個咸豐年間，縣境無一日太平。咸豐十年，石達開部數萬人直撲百色廳城，城破。太平軍逃遁之後，地方社會仍不得安寧，直到馮子材率軍討伐，亂世漸平[11]。

西江上游地處滇桂交界處的西林縣治，是兩省貿易的重要市鎮。據咸豐元年的調查，城區有3,600戶，12,000口，遠遠超過一般的縣治規模。有意思的是，「一城居民均係外來」、「四鄉居民悉係本地世居」。咸豐初年，當地有匪徒揭竿。咸豐十年，石達開部不下十萬，破城焚殺，「殞命者十之六七。屍骸滿眼，血流成川，所經過之鄉，慘狀無異。西林之傷元氣，蓋自此始矣」。此後匪災不斷，西林人口不斷減少[12]。從遷江、百色至西林，咸豐年間開始的噩運幾乎都是相似的。

在兵荒馬亂的1850-1860年代，上林縣的鼠疫如果不是從雲南傳入的，還可能有別的途徑嗎？一條關於廣西本土鼠疫疫情爆發的新資料，引起了筆者深入探

11 光緒《百色廳志》卷8〈補錄〉。
12 民國《西林縣志・戶口》。

討的興趣。

在2000年夏天，由於新修水庫的蓄水，致使貴州興義縣、安龍縣和廣西隆林縣爆發人間鼠疫。鼠疫流行病學調查表明，水庫蓄水導致庫區鼠洞被淹，低地中的老鼠向高處遷移，使得高處單位面積上的鼠口增加，鼠的密度亦隨之增加。原來在庫區微弱流行的動物鼠疫，在新的條件形成爆發。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在廣西的一些偏僻山區，鼠疫自然疫源地要比人們原來想像的廣泛得多。原來一些不爲人所知的動物間鼠疫流行，由於人爲活動的加強，可能影響人類，引發猛烈的人間鼠疫之流行。與隆林縣毗鄰之西林縣，於2001年6月發生人間鼠疫。疫點爲縣城及附近地區，由於發現早，未及擴散，即被撲滅。

19世紀中葉廣西境內的社會動亂與戰爭，尤其是人數動輒多達幾萬、十幾萬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有可能對原本存在於當地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產生影響。2000-2001年在隆林縣和西林縣上演的悲劇，完全可能在1860年代的上林或龍州兩地上演。由於疫情的發生往往與軍人的行動有關，關於軍隊傳播鼠疫的說法，也就不脛而走，成爲定論。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更相信廣西境內的疫情，源自境內一兩個孤立的鼠疫疫點，即19世紀後半葉，廣西病菌來源於本土的自然疫源地，而不是其他。

四、鼠疫傳播：雷州半島—北海—廣州

伍連德同書中引用的一份19世紀末年的有關文獻，議及廣州疫情與廣西疫情的關係：

> 已逝世之袁賽(Chouzy)主教，曾留於中國四十年之久，常語余於1894年鼠疫發見於廣州之時，及其以前若干年，每年均有鼠疫發見於西江之南寧與桂縣，由當地探詢所得，且使余相信自1884年鉅大水災以後，每年中均有散例腺疫患者，發見於梧州。

所謂的「桂縣」應是「貴縣」之誤。其他兩個城市：南寧和梧州，與貴縣一道，都是西江航道上重要的城市。上引文獻暗示廣州的疫情來自廣西境內的西江流

域。冼維遜引用《檢疫病疫史》亦稱，梧州鼠疫在1880、1890、1893、1899至1901年均有發生[13]。不過，最近李永宸、賴文兩人的研究揭示，早在1879年，廣州城郊就已經發生鼠疫的流行了。

李永宸和賴文的資料來自1879年5月23日《申報》的記載[14]。茲將全文引錄如下：

> 俄羅斯國於今春流染奇癘，患者越宿即死，西語名曰「澀來」，纔知棄已退盡，曾疊登本報。今接香港信，知粵東番禺縣境亦有是疾。中國人謂為黑癍。人於日間患此，至晚即死。有一村落共死三百餘人。廣州西北郊有一地名紅山石基，每日約死十人，又有一村，共居九千人；已死四百餘。甚可畏也。

李永宸、賴文接著引用1957年東莞縣防疫站的調查，認爲「境內流行最早年代是1880年，1880年與1891年均流行於莞城鑛、西隅區阮湧街」。東莞與番禺接壤，疫情於傳入番禺的次年傳入東莞是完全可能的。只是當年冼維遜未識得上引《申報》資料，故未作聯繫。

在李永宸和賴文於2003年發表的上引論文中，他們認爲：「把東莞與《申報》報導聯繫起來看，兩者恐怕不是巧合，似乎早在19世紀70年代末鼠疫已在廣州和珠江口地區局部流行了。」不過，在上引2004年出版的著作中，他們對於這一觀點有所修正：「由於廣州港與北海港、湛江港的海運聯繫，珠江口一帶早在19世紀70年代末就發生鼠疫局部流行，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這兩條疫情資料畢竟顯得突兀，尚缺乏更充足的佐證，故僅錄之存考。」[15]如果我們將1884年的廈門鼠疫，以及下文將要述及的1884年的海澄鼠疫、1887年的漳州鼠疫以及1888年的惠安、莆田等地的鼠疫聯繫在一起看，番禺和東莞的兩條資料就不顯得突兀了。也就是說，在番禺鼠疫疫情尚未發生大面積流行之時，閩南的鼠疫流行已在一個相當大的範圍內發散開來。只是1884年廈門的鼠疫被稱作「香港症」，說是

13 冼維遜，1988，頁107。
14 李永宸、賴文，2003；又見賴文、李永宸，2004，頁340-341。
15 賴文、李永宸，2004，頁341。

來自香港，而是年香港根本沒有鼠疫流行，此處仍有可疑之處。不過，如果廈門的鼠疫不是來自本土的話，貨船將自己在東莞一帶的染疫，誤爲在香港染疫，也是可以理解的。

仍讓筆者感到不解的是，在證據相當確鑿的1879年廣州城郊疫情，怎麼可能與1880年梧州的疫情有關？李永宸、賴文查西江沿線的封開、鬱南、德慶、高要、肇慶、三水等地的地方志，均無1894年以前發生鼠疫的記載，甚至沒有發生瘟疫的記載。1894年，最鄰近廣州的三水縣發生鼠疫，1898、1901年居三水上游的高要縣發生疫情，估計是鼠疫。顯然，西江流域的鼠疫流行，是從廣州傳去的。

依據同樣的文獻排比，李永宸和賴文也否定了廣西鼠疫從陸路向東傳入廣州的可能性。據冼維遜書和《中國鼠疫流行史》，東莞的疫情發生於1880年，台山1882年，新會1885年，其餘各縣皆在1890年及以後，其中陽江、開平、順德、香山四縣縣志均明確記述本縣鼠疫由省城傳入。由此，李永宸和賴文相信1894年6月14日《申報》的描述：「從前只起於省垣，近更及於省鄉鑛，愈染愈多，愈推愈遠。」班凱樂將陽江疫情誤作西部傳入，是不妥當的。

通過對於北海和廣州間海船貿易的考察，李永宸和賴文認爲廣州的鼠疫是通過海運直接從北海傳入的。這一結論，似乎只是否定北海—廣州之間海運以外的商路—鼠疫疫情傳播模式，其實何嘗不是對雲南—北海間商路—鼠疫疫情傳播模式的否定。只是賴文、李永宸聲稱：「近代廣東的鼠疫是從雲南經廣西傳入，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上文已經表明，這個「不爭的事實」其實大有爭議。

根據《中國鼠疫流行史》所載資料，北海附近地區鼠疫流行的時間：欽州1871年，合浦(廉州)1880年，廉江(石城)1877年，遂溪1872年，湛江1879年，雷州(海康)1882年[16]。在1899年湛江分遂溪、吳川兩縣，名「廣州灣」，其主體分自遂溪，故可大致視作遂溪縣的一部分。廉州、欽州與北海同屬廉州府，石城(廉江)屬於高州府，遂溪、海康屬於雷州府。

從地理上看，廉江縣陸地與廉州府境相連，遂溪、海康隔海灣與北海相望。從時間上看，廉江、遂溪兩縣疫情發生的時間雖然晚於北海，卻在合浦之前。在

16 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1988，頁1482-1569。

班凱樂的研究中，儘管她也將廣州疫情當作北海疫情輸入的結果，但她卻設置了這樣一條陸上路線，即北海的疫情從海上傳入湛江，再傳至吳川和電白，再至陽江。本文的問題是，遂溪縣在1872年即已發生疫情，湛江本身就是遂溪縣的一部分，疫情還需要從海上傳入嗎？

據《中國鼠疫流行史》，1872年遂溪縣的鼠疫疫情，是1950年代的調查所得。兩個年代雖然相隔80年，但還是處在人類生理年齡的範圍之內。也就是說，在1954年鼠疫史的調查工作展開之時，一個90餘歲的老人尚可能以親歷者的身分，回答調查者的詢問，而更早時代的疫情顯然無法通過此類調查來獲得。如果遂溪縣在1860年甚至1850年代有鼠疫發生的話，1950年代的調查員已經無能爲力了。在高州府境，地方志只記載了光緒十七年(1891)的鼠疫疫情，卻未追及更早的時代。而據《中國鼠疫流行史》調查，廉江的疫情可以上溯至1885年。

在上引伍連德書中，天主教士對於1891年和1892年的疫情有如下觀察：

> (疫情)1891年見於廉州之高橋，根據報告，死者以數千計。于1892年三、四月時，腺疫發見於距北海東一百英里安鋪附近之區，居民死者甚多。地內氏由當地天主教教士處，得有以下之報告：「腺疫為該地附近一社區之地方病，分散病例，終年可見於該處，但有時春季間是病乃流行，彼時唯一避免之法，則為離開該區，直至大雨降後之時。」

在今天的區劃中，高橋屬廉江縣轄，而安鋪爲廉江縣之一著名港口，據此可知兩地相距甚近。根據《中國鼠疫流行史》，1885年安鋪鎮的疫死人口只有1人，1889年也只疫死1人，而至1891年，安鋪及其附近四個村莊的疫死人口多達703人。再回過頭來檢討遂溪縣的疫情，1954年的調查表明，1872年，遂溪縣三區黃略公社新村鄉新村發生患者80人(死亡)，1873年又在該公社冷水鄉光毛村流行，發生30人(死亡)，並稱在發生病例前村內亦見死鼠。當一個村莊的疫死人口多達數十人時，可以推測在此之前，鼠疫的散在性流行已經發生，安鋪的例子可以爲證。從這一角度思考，遂溪縣的鼠疫流行當然可以往前追溯。如果在1872遂溪疫情爆發之前的五年，鼠疫的散在性流行已經發生，那麼，遂溪的疫情就可能與北海同時發生。

事實上，有一段資料可以證明雷州半島上的鼠疫早在北海鼠疫發生之前即已發生。光緒年間的廣東醫生區德森在《時疫辨》卷3中提到同治年間，鼠疫在龍州、廉州和高州等地爆發，在這些地區很快就出現了一系列治療鼠疫的驗方，如高廉驗方、茂名驗方、石城驗方、高州生藥驗方、高州外治驗方、雷州外治驗方和瓊州外治驗方等治療鼠疫驗方，這些驗方的形成，按照區德森的說法，是「自同治五年至光緒初年，高、廉、雷、瓊以及廣西、安南等處醫核驗方」[17]。同治五年即1866年，早於北海疫情發生一年。由於這些藥方都是「驗方」，即證明有效果的藥方，不太可能形成於疫情發生的當年。所以，我們推測雷州半島的疫情發生，要早於1866年。

在雷州半島的吳川縣，有吳宜崇氏著《鼠疫原起》一書稱：「光緒十六年(1890)冬鼠疫盛行，先是同治年間此症始于安南，延及廣西，翌年正月梅錄、黃坡及信宜皆有之，三月後高州郡城亦大作。」[18]仔細分析，其中的「翌年」已是1891年，疫情何時「延及廣西」，並不詳知。余伯陶在《鼠疫抉微》中說：「鼠疫初名核瘟，同治間安南已有是病，於光緒己丑(1889)、辛卯(1891)間，由安南傳入廣西，壬辰(1892)、癸巳(1893)歲，漸傳之廣東之高州，患疫而死者數萬。甲午(1894)歲傳之廣州死者五六萬，乙未年(1895)高州又起，欽(州)、廉(州)亦相繼而作。」[19]同樣不明疫情傳入廣西的時間，不僅如此，對於疫情何時發生於高州、欽州和廉州，也不甚清楚。聯繫上引區德森的說法，無論是同治五年還是光緒初年，雷州半島及高州鼠疫疫情之發生，都不會遲至1890年以後。1890年，已是光緒十六年，而不是光緒初年。這樣一來，就沒有理由認爲遂溪的鼠疫是從北海傳入的，反過來的推測卻是成立的。再聯繫到廣西境內最早有關鼠疫的記載出現在1867年的上林，時間晚於雷州半島，更是排除了疫情從廣西傳入的可能。

再回到安鋪的例子中來。在報告疫情的天主教士看來，安鋪一帶的鼠疫疫情已經是一種地方病了，大爆發之前，每年都有散在性發生，全年都有，春季間有流行，老百姓採用逃離的方法避疫。這暗示著在一個很長的時代裡，鼠疫的散在發生和小流行，以及老百姓的避疫，已經構成當地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17 區德森，《時疫辨》卷3，〈歷考鼠疫驗方〉。
18 轉引自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1988，頁1480。
19 余伯陶，《鼠疫抉微》卷一〈疫情篇第一〉，《中國醫書大成》第四冊，頁739。

還有一段資料需要重新加以討論。在1950年代的調查稱，據安鋪老中醫和群眾說，廉江縣鼠疫起點在安鋪。當時安鋪舉人黃藝中到印度支那(今越南海防)探望華僑，攜多具死於瘟疫的華僑屍骨回國，存放安鋪觀音廟內，除部分認領外，其餘80多具葬於安鋪豆鼓村山高棚附近山崗，翌年豆鼓村發生鼠疫，因此一般認爲安鋪鼠疫與此次運骨骸有關，隨後縣屬各地區亦隨之發生，此後便連年發生[20]。用海船攜屍或攜棺80具以上從越南回國，這件事情本身也是不可想像的。據《中國鼠疫流行史》中的資料，安鋪的疫情，先有散在發生，再有爆發流行。安鋪疫情，並非從海防屍體歸國才開始。

不過，這一資料卻是揭示出另外一個事實，即在19世紀後半葉，環東京灣地區，可能是一個巨大的鼠疫流行區。各個區域之間的疫情相互感染，互相影響。從今天動物間鼠疫流行的情況看，雷州半島及其相鄰之合浦縣，極可能是明清以來即已存在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從這一角度思考，1867年北海的鼠疫疫情，是當地動物間鼠疫波及人間之結果。對於廣東省而言，19世紀後期的鼠疫是本土的，不是外來的。

五、鼠疫復活：從雲南到廣東

自195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大多數地區鼠疫的停息，雖然與大規模滅鼠滅蚤的愛國衛生運動有關，卻也不儘然。以雲南爲例，雖然人間鼠疫和鼠間鼠疫在1955-1956年間得到了全面控制，但是，從1982年開始，鼠間鼠疫和人間鼠疫重新活躍起來。

然而，這只不過是全球鼠疫復活趨勢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鼠疫呈下降的趨勢。在1953年世界鼠疫病例只有156例。然而，進入1980年代以後，許多國家的鼠疫流行漸成抬頭之勢，1981年全世界鼠疫病人有187例，1987年有1,055例，1992年僅薩伊、越南、緬甸三國就有1,355例。在美國，1944-1953年只有加州等三州流行鼠疫，到1996年，增加到15個州。在獨聯體(前蘇聯)，

20 廉江縣鼠疫防治站，1956，《鼠疫調查總結報告》，內部印行本。

1960年代僅有3塊活動性疫源地，而今高活動性動物鼠疫疫源地多達16塊[21]。

鼠疫學家認爲，溫度和溼度、土壤水文、地震與地磁的變化，以及其他一些尚不明瞭的自然因素，都有可能對鼠疫菌及其宿主的活動產生影響[22]。還可以雲南的例子深入地說明這一點，1982-2000年雲南鼠疫流行的地區見表17.1。

據表17.1可見，從1982年雲南省首先觀察到鼠間鼠疫的再度復燃，到2000年已從44個縣(市)監測到家鼠鼠疫資訊，累計發現疫點/次1,392個。這44個縣中有37個縣(市)「爲1982年後首次發生的現疫縣」。

有專家指出：「22縣(市)家鼠鼠疫波及人間，發生腺鼠疫273例，鼠疫從滇西、滇西南逐漸向滇南、滇中腹地擴散，其態勢嚴峻，已構成對雲南省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威脅。」[23]又有專家稱，雲南的人間疫情特別活躍，僅1990-1992年，就在人口比較密集的縣城中發現疫情。何以縣城中的疫情沒有轉化爲大規模的人間鼠疫，這位專家的解釋是：「慶幸的是雲南家鼠型鼠疫菌的內毒素比較低，染疫後出現重症病例的機會少，沒有肺鼠疫病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24]

雲南省的疫情是怎樣發生的？各地疫情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以盈江縣爲例，1990年以來，疫情不斷擴大，流行鄉鎮不斷增加，疫情由平原壩區向山區蔓延，傳播工具可能是邊境貿易的發展所帶來的商品的大量流通[25]。也有專家認爲，1995年4-10月間普洱、江城、思茅、景谷四縣相繼首次發生人、鼠間鼠疫，除了疫區內鼠蚤密度指數增高這一根本原因外，還有其他。例如，他們注意到，這些縣市的首發疫點，多發生在公路邊村寨的汽車修理點、停車場、貨物轉運站和糧食加工廠等場所，所以不能排除疫鼠、疫蚤搭交通工具由鄰縣傳入的可能[26]。

從地圖17.1標識的縣名和時間看，1982年以後，雲南鼠疫從滇西南向滇南、滇中地區的傳播，由西向東，由南向北，路線大致清晰，時間基本明確。雖然1990年發生疫情的耿馬距離隴川、瑞麗和畹町偏遠，從公路系統看，要經鎮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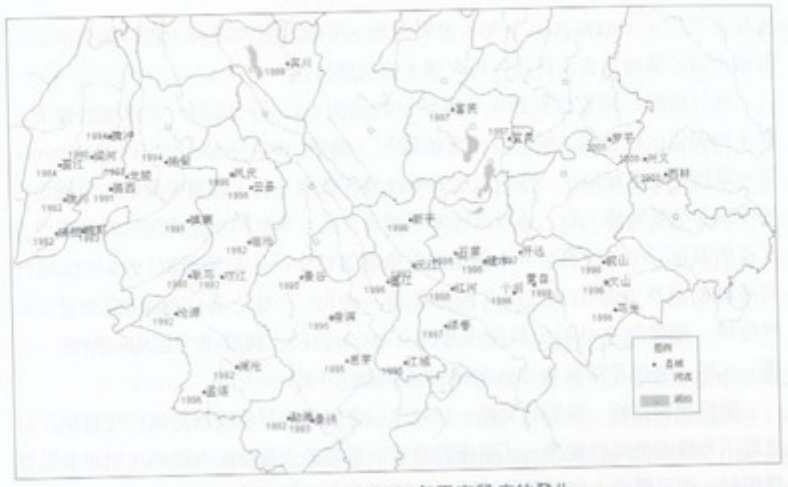
21 董興齊等，2001，頁225-229。
22 李希近，2001，頁116-118。
23 黃寧波等，2000，頁31-32。
24 樊永貞等，1997，頁105。
25 楊增源、王旭，1998，頁67。
26 李天元等，1996，頁28。

表17.1　1982-2000年雲南家鼠鼠疫流行地區

年份	檢疫地區(縣市)	縣數	疫點數	檢菌總數
1982	瑞麗*、隴川*	2	13	280
1983	瑞麗、隴川、畹町*	3	29	246
1984	瑞麗、隴川、盈江*	3	41	297
1985	瑞麗、隴川	2	4	21
1986	瑞麗、盈江	2	14	39
1987	盈江、畹町	2	4	5
1988	隴川、賓川*	2	4	13
1989	隴川	1	2	5
1990	瑞麗、隴川、盈江、梁河、耿馬*	5	66	419
1991	隴川、瑞麗、盈江、梁河、畹町、潞西*、耿馬、鎮康	8	40	180
1992	瑞麗、盈江、潞西、臨滄*、金源*、雙江*、瀾滄*、猛海*、元江*	9	50	263
1993	隴川、盈江、龍陵*、臨滄、瀾滄、景洪*	6	62	124
1994	隴川、瑞麗、盈江、梁河、畹町、騰衝*、施甸*	7	31	158
1995	隴川、盈江、潞西、臨滄、耿馬、鎮康、瀾滄、思茅*、江城*、普洱*、景谷*	11	47	191
1996	隴川、盈江、潞西、梁河、臨滄、耿馬、雲縣、鳳慶、孟連、新平*、墨江*、猛海、簡舊*、石屏*、建水*、馬關、文山*、硯山*	18	150	234
1997	隴川、盈江、潞西、耿馬、鎮康、思茅、瀾滄、墨江、孟連、景洪、猛海、雙春*、開遠*、簡舊、文山、硯山、宣良*、富民*	18	106	222
1998	盈江、梁河、耿馬、臨滄、鎮康、墨江、思茅、瀾滄、孟連、普洱、景洪、猛海、開遠、紫自*、文山、硯山、邱北、馬關	18	114	280
1999	隴川、盈江、潞西、梁河、臨滄、鎮康、雲縣、猛腊*、景洪、猛海、思茅、普洱、孟連、鎮源*、瀾勐*、紅河*、文山、硯山、邱北	19	79	
2000	梁河、盈江、潞西、雲縣、鎮康、臨滄、瀾滄、普洱、景洪、簡舊、開遠、瀾勐、紅河、硯山、文山、邱北	16	140	
合計	44個縣市	158	1392	

資料來源：董興齊等，2001，頁225-229。檢菌總數另據黃寧波等，2000，頁31-32頁。黃文的統計數截止於1998年，且黃文中的染疫市縣略少於董文。

說　明：*為1982年後首次發生的現疫縣，即指1950年代未出現疫情的縣。



地圖17.1　1982-2001年雲南鼠疫的發生

潞西或龍陵，才可抵達隴川等縣。1991年鎮康和潞西兩縣疫情的發生，似乎恰恰證明疫情是沿公路傳播的。

然而，遍查已經正式公開的雲南各縣疫情報告，絕大多數縣的疫情，卻是當地疫源地的復燃，而不是由外傳入。如1996年新平縣平掌鄉發生的人間鼠疫，疫區地處哀牢山脈，距縣城167公里，海拔1100-1900米，出現疫情的村莊距村公所有10公里，不通公路，不通電，無任何外來疫情傳入的可能[27]。1997年開遠發生動物間鼠疫流行，流行範圍達5個鄉，共出現11個疫點，「雖有部分疫點分布於交通便利的壩區，但仍有部分疫點分布在交通不便的半山區。各疫點相距較遠，沒有鼠疫傳入的任何線索」[28]。如1997年宜良縣出現的22例人間鼠疫患者，就是由當地的動物鼠疫感染的[29]；至今未見有當地存在外來疫情的報告。1998年，蒙自發生人間鼠疫，據調查，由於當年7月暴雨成災，致使大量田野家鼠遷入居民區，室內鼠類密度增大，染疫機會增多，導致動物鼠疫病爆發流行，從而

27　梁雲等，1997，頁44-45。
28　李俊勇等，2000，頁57-58。
29　張命民，1999，頁221-222。

波及人間[30]。在2000-2001年間，貴州興義、安龍、廣西隆林、西林及雲南羅平等縣疫情的暴發，也沒有任何外來傳入的痕跡可言。

流行病學的調查也得到來自實驗室的證明。以梁河爲例，梁河位於騰衝之南，1990年出現疫情，晚於其南部的隴川、瑞麗、畹町和盈江。在1982-1990年間，隴川、瑞麗和盈江三縣的鼠疫幾乎沒有間斷過，有人認爲梁河縣的鼠疫是由盈江或其他鄰縣輸入的。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分析，專家們認爲梁河縣的鼠疫應當是當地固有的疫源性復活。他們還從鼠疫菌質粒DNA的特徵證實1990年分離自梁河縣的菌株並非由盈江或其他鄰縣傳入的[31]。又如元江，1992年當地發生鼠疫疫情，據實驗室分析，其鼠疫菌沒有4Mdal質粒，與瀾滄、猛海、景洪、思茅、江城、普洱等縣具有4Mdal質粒的鼠疫菌不同[32]。

鼠疫專家比較一致的意見是，1982年以來雲南的鼠疫疫情是鼠疫疫源地在靜息若干年後的地區性復燃。「鼠疫的發生不僅在過去舊疫區內能再次出現多點爆發流行，而且歷史上無記載的地區，只要處在自然疫源地分布範圍，具備相似的生態環境，也可能突然發生鼠疫流行。」[33]

以此觀之，乾隆年間首發於麗江地區的「疫」或「大疫」，我們將其視作鼠疫。滇西鼠疫由西向東的傳播，在班凱樂和我們以前的研究中，都視作是沿商路傳播的典型案例。然而，在1982-2001年間雲南鼠疫的流行史告訴我們，乾隆年間可能是大週期意義上雲南鼠疫的大爆發年，所謂的沿商路傳播史，也可能是各個鼠疫疫源地疫情的先後爆發。

回到廣東疫情的討論中來。在1894-1920年間全省鼠疫流行達到高峰，波及當時全省的69個縣市。此後疫勢減弱，大部分地區鼠疫逐漸自然停熄，自1940年以後漸局限於雷州半島，至1953年人間鼠疫被控制。因此，專家們認爲這一帶形成了一個比較固著的鼠疫疫源地。該疫源地主要在遂溪縣的全境，廉江的九洲江下游一帶[34]。

30 高子厚等，1999，頁33-34。
31 彭何碧、董興齊，1994，頁161-162。
32 馬永康等，1997，頁372。
33 李強，2001，頁234。
34 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1988，頁1469。

這一觀點與歷史文獻的記載頗不相合。早在17-18世紀，吳川、遂溪一帶有不明症狀的疫情流行。在石城縣，康熙二十年(1681)，「疫更烈，邑人多死，戶絕者幾半」；乾隆二十九年(1764)，「疫大行，邑人多死」；道光三年(1813)，「疫大行，民多奇死，死於頃刻」[35]。從死亡率高和病程急速這兩個特徵看，只能是鼠疫或者霍亂。霍亂傳入中國的時間在1817年。由此推之，康熙、乾隆的二次疫情可能爲鼠疫，道光三年的疫情不能確定究竟爲鼠疫還是霍亂。類似的記載見於海康、遂溪和化州[36]。在海康和遂溪，成化元年(1465)「城中疫起，十死六七」[37]之類的記載，似乎可將當地的鼠疫流行史提前到15世紀。與後世的鼠疫流行聯繫起來思考，極易讓人相信這一區域本來就是鼠疫自然疫源地。

在1973年，應用世界衛生組織鼠疫專家委員會推薦的鼠疫間接血球凝集試驗(IHA)方法，從遂溪、廉江(石城)和雷州(海康)均檢出活鼠血清IHA陽性，隨後在1975-1977年間鄰近的合浦(廉州)也檢出IHA陽性，此後至1988年，幾乎每年都可檢出鼠疫IHA、RHA(反相間接血凝試驗)或RIP(鼠疫放射免疫沉澱試驗)陽性，其中1973、1974、1978、1983、1985年的IHA、RHA陽性滴度達到鼠疫動物病流行滴度標準(1：160以上)，從而證實雷州半島存在疫源地，也說明從1953年至1988年的36年中，疫源地內仍有微弱的鼠疫動物病流行[38]。可以推測，明清以來，一直存在於此地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並沒有被根除。動物間的鼠疫流行，仍然在微弱地持續。

六、結論

在19世紀末葉發生的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香港是疫情擴散的中心。香港的疫情來自廣州，廣州的疫情來自北海，北海的疫情來自周邊地區，其中尤以雷州半島爲最主要。現有的證據表明，在1866年以前，雷州半島及其周邊地區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鼠疫疫區。雷州半島的鼠疫來自當地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與雲南無

35 光緒《吳川縣志》卷十〈紀述・事略〉。
36 賴文、李永宗，2004，頁82-91。
37 嘉慶《海康縣志》卷一〈疆域〉；道光《遂溪縣志》卷2〈紀事〉。
38 沈榮煊、李海，2006。

義〉，《預防醫學情報雜誌》第10卷第3期，頁161-162。
廉江縣鼠疫防治站，1956，《鼠疫調查總結報告》（內部印行本）。
楊增源、王旭，1998，〈1995年盈江縣鼠疫流行動態及流行病學分析〉，《地方病通報》第13卷第1期，頁67。
董興齊等，2001，〈雲南省鼠疫流行與防治概況〉，《中國地方病防治雜誌》第16卷第4期，頁225-229。
樊永貞等，1997，〈1949-1992年中國人間鼠疫流行病學特點〉，《地方病通報》第12卷第1期，頁105。
賴文、李永震，2004，《嶺南瘟疫史》（廣東人民出版社）。
Benedict, Carol, 1966, *Bubonic Plague in Ni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7
The Plague of Guangdo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ndemic Disease or Exotic Disease?

Shuji C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ubonic plague that struck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in 1894 was a landmark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epidemics. Researchers who have studied the origins of this plague, from Lien-Teh Wu to Carol Benedict, have embraced the mainstream view that the Yersinia pestis was from Yunnan, being carried by the Qing army from Yunnan to Beihai. Although plague experts in Guangdong held opposing views, they were limited to a logical argument, and had no tangible evidences to prove that the old view was wrong. This paper not only conducts a rigorous analysis of previous accounts, but also draws on some new historical data to overturn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Guangdong plague being in Yunnan. The Yersinia pestis that ravaged Guangdong in the 19th century was actually from the Plague Natural Foci in Leizhou Peninsula, a part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spread of plague in south China was mainly through the village-to-village mode, and inter-regional commercial trade could not help the long-distanc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Keywords: bubonic plague, Guangdong, endemic disease, exotic disease